

# 语言学

中国与世界同步

中国与世界同步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语言学

中国与世界同步

Q193

钱军 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京)新登字 15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学 中国与世界同步/钱军编. -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2

ISBN 7-5600-2865-9

I. 语… II. 钱… III. 语言学-研究-文集 IV. H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6296 号

语言学

中国与世界同步

钱军 编

\* \* \*

责任编辑: 申 葳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cn>

印 刷: 北京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9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600-2865-9/H·1502

定 价: 26.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010)68917826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68917519

## 序

北大英语系为庆祝胡壮麟教授 70 诞辰编印一本学术论文集，这是一件盛事，我深感高兴。

在外语界，胡先生素负盛名，这是因为：

第一，作为语言研究者，他成绩卓著，不少外语系研究班师生正在读他的书。

第二，作为系统功能语法的传播者，他非常成功，许许多多的人(包括我)通过他才能了解 M. A. K. Halliday 的专门学问。

第三，在治学方面，他采取科学家的态度，不论谁跟他讨论问题，他都只问是非曲直，不存门户之见。对别人提意见，他知无不言(我是受惠者之一)；别人对他提意见，他认真考虑。

在 70 岁前，胡先生已有值得自豪的业绩；在 70 岁后，他将有更值得称赏的成就。

写到这里，我举起杯来，遥向胡先生致贺，向北大英语系同事们致敬。

王宗炎

2001 年 3 月 30 日

于广州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

## 编者说明

为祝贺著名语言学家胡壮麟教授 70 诞辰,我们编辑了这部学术论文集。

文集分为三部分,依次是序言、自述、论文。序言和自述简练而全面地评价或回顾了胡壮麟教授的治学道路。采取当事人自述的形式,一方面是参照了西方语言学史学的做法(比如已经出版了三卷的语言学家自述《第一人称单数(*First Person Singular*)》),认为这种形式更有史料价值;另一方面是因为这部论文集的编辑原则只收录纯学术论文,因此当事人的自述可以取代他人撰写类似的文章。

本文集收集的 38 篇论文可分为 11 个部分:语言学方法论(3 篇),语言哲学和语言逻辑(2 篇),词汇学(4 篇),语用学(4 篇),语篇语言学(6 篇),认知语言学(5 篇),文体学(2 篇),对比语言学(2 篇),语言、思维、文化(4 篇),语言学思想史(5 篇),语言教学(1 篇)。这种划分主要是为了方便语言学的入门者和一般爱好者。它只是大致的,聊胜于无。11 个部分的顺序以及各部分内部论文的顺序与重要性的程度无关,更多的还是基于对读者的考虑,比如第 1 篇《功能主义与形式主义》。胡壮麟教授“作为系统功能语法的传播者,他非常成功”(王宗炎序言)。他和他的同事们(所谓“澳帮”,即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在澳大利亚师从 M.A.K. Halliday 的一批中国学者)所做的工作几乎尽人皆知。在这样的情况下,注意功能主义的多样性,注意“国际语言学界形式主义与功能主义开始对话”(徐烈炯;比如 Susumu Kuno、Petr Ssall 等人的工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同样,第 38 篇《语言测试的目标与实现手段》对语言测试史上主要测试方法的目标和实现手段作一概述”(王振亚)。这样的论文也可以归入语言学思想史部分。但是

为了突出语言教学,把该文单独列为一个部分。而重视语言教学从 Otto Jespersen 到 Halliday 也是一脉相承的。

这部文集从酝酿到完成,历时一年半。编辑过程中就许多问题与高一虹教授、刘世生教授、彭宣维博士等反复讨论,并且在不同场合广泛征求了同事们的意见。刘世生教授拟定了书名,彭宣维博士提供了详细的联络名单,他们以及徐赳赳博士在各自单位做了许多联络工作。编者向他们,向论文集的所有作者,向因故不能撰稿但及时答复的所有同仁致以衷心的感谢。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霍庆文先生在编者困难之际,伸出援助之手,玉成此事,以行动让编者认识到“一个学术性、教育性的出版机构”的含义和价值。编者谨代表所有作者向外研社致以崇高的敬意。历史在记录胡壮麟教授 70 华诞的同时,也记录下了外研社为推动中国语言学的发展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钱军

北京大学英语系

2002 年 1 月 14 日

# 求索述怀

胡壮麟

钱军博士语我，他在策划编一部由国内学者撰稿的论文集，以庆贺我即将到来的七十寿辰。我对自己年龄的暴增为之一怔。在与岁月较劲的过程中，人总是弱者，生老病死，躲也躲不过去。钱军博士又嘱我为这本论文集写上几句话。这是一个无法推却的既荣幸又艰巨的任务。要将70年的心路历程压缩成一篇短文谈何容易？这里，我勉强为之。

在行文之先，我向给我多年指导和为本书作序的王宗炎老先生致以无限敬意；向参与撰稿的学者们、朋友们表示虚心学习；向策划和主编本论文集的钱军博士表示衷心感谢。

## 一．曲折人生

我1933年3月31日出生于上海。我的名字有一些不平凡的来历。我哥哥(中国工程院院士)出世后，取名壮麒。当时胡氏家族中约定，两房中如再生男儿，则为“壮麟”。由此激发了一场违反今日计划生育的育儿大奖赛。我婶母接连生了3胎女的，我妈妈给大姐和哥哥添了两个妹妹，最后喜得麟儿。为庆祝我的出生，我家举办大型堂会，请了上海著名滑稽演员(类似今日的笑星)江笑笑、鲍乐乐来家演出，这是我母亲日后经常自夸的话题。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发动松沪战争，把我父亲在江湾的宅第炸毁，我们举家逃难到上海市法租界最边缘的姚主教路(今天平路)，挤在一栋石库门房子里。父母经常提起“九·一八”、“一·

二八”、“八·一三”等国难，于是我自幼对“东洋兵”怀有深仇大恨。在英法租界上，有一次观看到“万国军团”耀武扬威地举行阅兵典礼，方阵中甚至有他们从印度和越南招来的“红头阿三”和“安南兵”组成的雇佣军，好奇心之余，一股无名火顿时燃起。解放后，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总是很有感情的。

我从小喜欢看书，不善交际。我看过的书对我世界观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还在上海沦陷时期，由于苏日尚未宣战，我在中学附近的苏联时代出版社买到过有关苏联卫国战争和反法西斯的书籍。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我看了鲁迅、郭沫若、闻一多、冯至、臧克家、胡风、冯雪峰、巴金等人的大量作品。待蒋家王朝倾覆的前夜，我居然能在住家附近的交通大学校园内买到过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何其芳的《夜歌》、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等书籍；经历了从“象牙塔”、“小布尔乔亚”、“尖头蛮”等旧词语向“普罗列他里亚”、“蜕变”、“解放”、“斗争”、“改造”等新思潮的过渡。1948年我在上海《新夜报》两次发表了“语屑”一类的小品，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在《新闻报》发表了我第一篇抨击社会不公正的杂文，如实反映了我少年时期的精神境界。

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新中国的大方向已不可逆转，我所熟悉的作家绝大部分留在大陆，去台湾的只有胡适、梁实秋等少数人。1950年夏我参加高考。当时国立大学分大区统考，另有私立大学单独招生，我报了4所大学，有华北地区统考的清华大学外语系，华东地区统考的复旦大学新闻系，上海私立圣约翰大学的新闻系，和上海私立沪江大学英语系。不久，捷报频传，全部按志愿录取。我最后选择了北上到清华大学学习。

进入梦寐以求的清华园，我受到了“清华园是革命家庭，外国语乃斗争武器”的理想教育。<sup>1</sup>在清华园罗马式白色大礼堂中，每周聆听艾思奇、孙定国、胡华、何其芳、胡乔木、乔冠华、黄华等老革命者的鼓动人心的大课。在全国如火如荼展开的土地改革运动和抗美援朝运动激发下，我曾报名参军，未能如愿。1951年12月，我参



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2年7月31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有不少朋友和老师在我政治思想的成长道路上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我永远感谢他们的指引。我祝愿他们万事如意,健康长寿。

我在不同单位工作期间是尽力的,有成绩的。我在总参工作期间曾研究过一个课题,深受当时的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赞赏,批转中央书记处毛、刘、周、朱、陈五位书记圈阅,并因此获得总参先进工作者的称号。我在密山农垦局858农场工作期间,带领一批部队转业的知识分子和一些元帅的副官们,两次获得红旗小组的嘉奖。我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期间,虽然没有系统学过农业科学知识,却先后担任了情报室的翻译组组长、情报组组长和国内组组长。我在北京大学曾任校学位委员会委员、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系主任和代理总支书记,1993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师。

从反右起,我常在运动中被打入另类。尽管如此,我不想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的反潮流的英雄,也从来没有堕落为“反共义士”。我认为,党的领导应当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就个人而言,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除家庭出身我无法选择外,我个人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

有三股力量始终鼓励着我前进。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不忘学习,在书本中学,在生活中学,在运动中学。1959年我调离北大荒辞别友人周叔余君时,我给他留下“两年镰锄十年书”的诗句,以诗明志。这一诗句意义双关:两年的劳动锻炼,使我们学到过去念十年书都学不到的知识;其次,这次回京后要珍惜时光,好好读他十年书。<sup>2</sup>第二,文化大革命后许多人高呼精神支柱的消失,我却始终认为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是科学的方法论。再一股力量来自我的妻子,我感谢她的理解、信任和支持。在工作上我们互相帮助;但在生活上,我自愧不如,全靠这位“马大嫂”了。<sup>3</sup>

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使我这个“臭老九”获得了第二次解放。过去害怕与海外关系沾边,而从1979年1月后,我有机会出国留学、访学、参加国际会议和探亲,先后去过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新

西兰、芬兰、荷兰、比利时、丹麦、韩国、新加坡，以及祖国的港澳台等地，有的达三、四次，使我既开阔了眼界，又增进了同国际学术界的联系。

## 二．学无止境

不久前，我从教育部的网上课程得知“名校名师名课程”的提法。虽然我认为，各种情况下都能出人才，就我个人而言，倒是“名校名师名课程”的典型产物。我念的圣芳济中学在上海素以严格治校闻名。其宝塔式教育至今令人心有余悸。在初踊有 6 个班，每年淘汰一个班（升不上去的学生必须离校），即初二 5 个班，初三 4 个班，高一 3 个班。直到高二，才保留 1 个理科班，1 个文科班，以至毕业。中学的英语教员中，有专长密尔顿研究的陆佩弦先生，解放后曾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任教授；有教英美历史、地理的童鉴青先生，后在北京外交学院任教。

我在清华一、二年级的班主任为刚从耶鲁大学返国的李赋宁先生，翻译课的教员为罗念生先生，大一国文教员为朱德熙先生。我在一年级时便大胆旁听外语系给四年级学生开设的“新闻学”，主讲老师特聘燕京大学新闻系系主任蒋荫恩先生。

1952 年院系调整，我来到隔墙的北京大学西语系。三、四年级的班主任先后为俞大綱先生和赵昭熊先生。我学习了王瑶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王铁崖的“国际关系史”、钱学熙的“报刊选读”等课程。

1978 年，我考取高教部的出国进修名额。我所就读的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聘请了系统功能语法创始人 M. A. K. Halliday 教授（语言学系系主任）和澳大利亚文学评论家 Leone Kramer 教授（英语系系主任，后任校长）。

1992 年，我在美国圣巴巴拉加州大学访学，有机会旁听 Wallace Chafe, Sandra Thompson 和 Charles Li（李讷）等名教授主讲的有关美国功能主义的课程。

除了在名大学的正规学习外,我还在不同时期参加过加拿大 Theall 教授在北大的语言文学讲习班;高教部主办的英国 Geoffrey Leech 教授的现代语法讲习班;Candlin 教授的社会语言学讲习班;翻译理论家 Eugene Nida 博士在北大开设的翻译理论和社会语言学课程。

三人行,必有吾师。我从年轻人身上,也学到不少东西。我认为,对学科的新发展,年轻人比我们更为敏感,接受能力更强。我特别要提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韩宝成博士和中国农业大学的李建华教授。他们在电脑更新和操作,以及上网技术方面对我的帮助,从来是不辞辛苦,随请随到,使我在信息时代,在同龄人中不至于落后。

### 三 . 从教书匠到博导

我从学生变成老师也有一段有趣的经历。在北京大学四年级时,教员支部书记严宝瑜老师曾通知我,毕业后留校当老师,当时我也答应了。待临毕业时突然动摇,坚决要求离校工作。有两件事使我改变了初衷。一是班上英语程度很高的同学经常向助教们提难题,让他/她们下不了台,我自感英语学得不好,不如自己识趣,趁早让贤。另一件事是有位二年级学生在元旦联欢时模仿一位教授用苏州话上课,逼真逼真,引起满堂师生捧腹大笑。不料,这事激怒了这位教授,觉得受了侮辱。最后,由我这个团总支书记代表低班的二年级同学在全体老师前向他道歉。如此紧张的师生关系使我再也不敢留校。19年后,我之所以回到北京大学,实在是出于无奈。文革后期我在中国农业科学院转学于各个干校,总毕不了业,原单位掌权的红卫兵们不让我回院工作,又死活不接受新华社、中国科技情报所等中央单位发的商调函,直到周总理多次强调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后,不得不把我“下放”到北京大学。这样,为了“混口饭吃”,我只好当上教书匠了。现在看来,这是缘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我一回北大，就参加了周一良先生的夫人邓懿教授的教学小组，学生基本上是陆军和空军学员，有不少是高干子弟，大的官至上将、中央机关部长或副部长。那时的口号是“工农兵学员上管改”，既改造学校，也改造我们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心中当然不服，因为我参军后，部队领导亲口说过，我们是解放后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我学生时期在暑假中主动去长辛店二七铁路机车车辆厂蹲过点，毕业后当过四年解放军，在农科院时干过六年农活，自认为是正牌的全能的“工农兵”老师。

1975年，我担任新入校工农兵学员的班主任和由四位老师组成的教学小组组长，一干三年。尽管有位军代表把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总想把我这个区区教学小组长看作是新时代的“走资派”。好在那些纯洁的工农兵学员，特别是党员班长暗中助我过关，这位军代表没有抓到多少可把我打死的炮弹。没有多久，他自己跟着四人帮成为阶级斗争的对象了。这是他始料所不及的。根据自己当学生和当老师的体会，我觉得“师”与“生”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老师不要用“师道尊严”去压学生；学生则应提倡“尊师爱师”。

对研究生培养工作，我曾有专文发表自己的观点。<sup>4</sup>我们国家硕士生的学制为2.5年至3年，似乎长了一些。当初讨论学制时，有些老先生认为中国学生水平低，资料少，需要较长的学制，才能达到硕士水平。现在情况变化了，老师和学生的水平都提高了，这个问题需要解决。

就学生培养而言，我始终认为，一个老师，特别是一个博士生导师，在众弟子中应培养出几个能超越自己的学生。老师的知识有限，但不要以个人有限的知识框住学生的志趣和能力。因此，我教过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中，有成了海洋法专家、图书馆学专家和作家的，有被任命为国家机关的处和司局级干部的，有当教授的；在博士生中，则有搞功能语法的，有搞布拉格学派的，有搞语言与文化的，有搞社会语言学的，有搞教学法的，有搞广告学的，有搞文体

学的,有搞汉英对比的,有3位已经成了博士生导师。我经常分享他们成功的喜悦。

就英语语言文学专业而言,我最反对英语只是工具的论调。因为这个看法模糊了专业英语和大学英语的区别。专业英语有自己的内涵,如语法、英语史、语言学、英美文学、文学批评、英美概况、英语国家文化等。就像计算机系学生把计算机课程作为专业课程,把英语作为工具,英语语言文学学生也有自己的专业课程,但把计算机作为工具。

#### 四. 学术研究

在简历中,我发表的论文始于1970年代末。其实,我在总参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期间就开始动笔写作。但受制于保密制度,当了无名英雄。在总参时以笔名公开发表的只有两篇文章,一篇是《美国军事科学哪些落后于苏联》,1957年发表于《解放军报》,后为《光明日报》转载;一篇是有关核武器的普及知识,发表于部队内部刊物。在中国农科院期间撰写了《世界主要国家农业发展趋势》(美国部分),参与翻译和主审《美国农业一百年》(30万字)和《第八届国际草地会议论文集》(100万字)。

我从1976年参加了Geoffrey Leech的讲习班后,开始发表有关英语语言学的论文。我的好友方立教授对我不时鼓励。从发表的论著来看,基本上集中于语言学,有关文学的较少。在治学上,从语言文学全面发展来看,与老一辈(如王佐良、许国璋、李赋宁先生等)相比自愧起步太晚,功底不足。我认为,语言和文学两者应是互补的。文学本身应是优美的语言,学习文学作品,能学到最好的语言;而语言是个总的概念,必然包括文学语言这个语类。两者的上层学科分别是文学批评和语言学,也是互相联系的,例如文学中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与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和系统网络思想有联系。

就语言学内部而言,有多种理论和学派,基本上可分为功能主

义和形式主义两大阵营。我认为两者的互动是推动语言学科前进的动力。如果只有一家之言,没有像巴赫金所说的对话和杂语,学科就很难发展。我的老师 Halliday 曾说,如果一门学科把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提不出新的主攻方向了,这意味着这门学科的终结。在不同学派的争论中如何来判断谁是谁非?我接受朱德熙先生在 1981 年访问澳洲时对我的教导:“拿出干货来!”

当代隐喻学的研究表明,各种学科,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有相通之处,互相启发,互相推动。例如,计算机科学的发展有不少得益于符号学的研究;而外语教学和研究,已日益采用计算机科学、统计学等成果。所有这些,应由各学科自行考虑该如何移植,最好不要由一个学科对另一学科妄加评论,规定方向。一个学科除本身研究外,还要注意从其他学科引进,这将为本学科在 21 世纪的突破创造更好的条件。

就科研和教学的关系而言,应互相尊重。我认为 1952 年院系调整后,大学过分局限于教学,是个失策。大学应当研究学科的前沿课题,然后把崭新的知识教给学生。同样,大学的正常教学工作和管理工作也应受到重视,以培养高水平的人才,并提出新的问题去推动研究。在大学工作的老师如果在三方面全面发展,是最理想的老师,但人总是有不同程度的差异,有强有弱,应互相尊重。教学搞得好的,不要否定有研究成果的;有研究成果的,不要轻视搞教学的。同理,没有优秀的管理人才,一切工作寸步难行。一台戏,要有不同的角色。

## 五. 今后的路程

早在中学时期的国文课上,我就最喜欢念诵屈原《离骚》中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章句。这后来成为指导我一生的座右铭。遗憾的是,诗人因理想的不能实现,最后作了投身汨罗江的选择,让滔滔江水荡尽他自己的抱负。但每当在政治、工作和生活中出现巨大困惑和压力时,我总是想,与其作一个不名不

白的怨鬼,不如在漫长路程上走一步是一步。如今,我成了七十老翁,终点已举目可及,人也早就告老还乡,似乎对这两句话可淡化处理了。然而在实际操作上,还不行。

首先,我在65岁时就按学校规定停止在北京大学招收博士生。为了兑现对老友钱瑗教授生前的承诺和对她的缅怀,我1999年起又在北京师范大学指导博士生。1998年清华北大互聘教授,我成了清华的双聘教授,决心以有生之年,与母校外语系师生共同努力,重现昔日的辉煌。而还有一些出版社时时给我布置这样那样的任务,盛情难却,难免“沽名钓誉”一番。还有一些学术会议,不好推脱,但起码通过这些活动,能从年轻学者身上接受一些新信息、新思想,可永葆学术青春。季羨林、王宗炎等老先生如此高龄还笔耕不辍,我区区后生岂有临阵脱逃之理。这样,我这个最后一班岗站到何时还是个未知数。

解放后,为了建设祖国,服从统一分配,一个家庭往往分处全国各地。我家兄弟姐妹六人散居六处,从未能团圆,便是一例。改革开放后,出国潮产生了新的社会问题,年轻人奔赴异国他乡,越走越远了。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我和老伴不知不觉地接受了清华、北大盛行的“空巢家庭”模式。但我们在感情上离不开生我育我的黄土地。再说,我们命大,这么多运动都挺过来了,现在总得享受一下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幸福晚年吧。我和老伴,早已退休,学校仍给以照顾,让我们在新世纪贷款买上北大清华共建的蓝旗营楼房,使我们能筑巢引凤,期盼着儿子孙子们常回家看看。“空巢”能支撑多久?这也是一个变数。

文学评论家好谈论文学作品中的永恒主题,如战争,如爱情,如生与死。我对战争与爱情的题材已无大兴趣,却深深感受老年痴呆症、老年忧郁症、这个肿瘤、那个癌症以至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威胁,而“安乐死”据说要待立法通过。最后的人生路程宛如穿越地雷阵,不知何时踩上一个地雷?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胡壮麟

2002年1月于  
北大清华蓝旗营

### 附注：

1 对这一提法的反思，见《大学外语教育》，载《学者论大学生的知识结构和智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1月。

2 世事难料。后又有“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这样，我在农村又拿了五年镢耙。但读他十年书的理想最后还是实现了。

3 “马大嫂”是上海方言中“买物，汰衣裳，烧饭”的首字谐音。

4 见“博导访谈：访胡壮麟教授”，《外语教学与研究》，2000年第3期。



## 简 历

胡壮麟,男,汉族,1933年3月31日生于上海。

### 教育、进修和访学

- 1938 - 1944 上海市私立淑英小学学生  
1944 - 1950 上海市私立圣芳济中学学生  
1950 - 1952 北京国立清华大学外语系英语组学生  
1952 - 1954 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学生  
1979 - 1981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研究生院,获优等文学硕士学位  
1992.1 - 1992.10 美国圣巴巴拉加州大学语言学系访问学者  
1995.9 - 1996.2 香港中文大学英语系访问学者  
1998.7 - 1998.8 香港岭南大学英语系访问学者

### 工作经历

- 1954.8 - 1958.3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二部翻译、参谋  
1958.4 - 1959.11 黑龙江省虎林县 858 农场职员  
1959.11 - 1972.12 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情报室翻译,编译组组长,情报组组长  
1973.1 - 1983.11 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英语教研室教员、讲师、副教授、英语教研室副主任、主任  
1983.11 - 1996 北京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系副教授、教授、博导、副系主任、系主任(至 1993 年 5 月)  
1997.2 - 北京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